

唐宋时期瓜洲沙洲变迁与沿江政区响应*

黄彬琦 王旭

提 要：中唐以来扬州、润州江面上的瓜洲规模逐渐扩大，最终同江北扬州相连，扬州滨江土地的增加与长江江面的收束使该地区政区变化频繁。江中沙洲时期，瓜洲分属于扬州、润州，并岸后以江为界，全属扬州。唐末以来扬州滨江区域逐渐发展，北宋初年通过割县与升州，扬州一分为二，长江两岸形成昇、润、扬、真四州两两相对的地域结构。南宋时期，瓜洲在某些时段遥隶镇江，以江为界与跨江遥隶代表着滨水区域两种不同的地域结构，后者重视对长江水域的控制，因此在宋廷构建江防体系与元军围困扬州的过程中凸显出来。

关键词：沙洲 瓜洲 滨水区域 地域结构 政区

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河道中存在过许多沙洲，沙洲坍涨靡常，其生长机制、土地利用方式、对长江水文的影响等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既有成果较多集中于历史自然地理，探讨沙洲生长发育的机制，或涉及沙洲的产权及引发的社会问题，时段上多聚焦于明清。^① 唐代以前，长江口在扬州以下，时润扬间江中有许多沙洲，最终瓜洲形成较大规模并同扬州相连，而在瓜洲并岸后的数百年间，其所处滨江区域的政区存在多次变化，这一情况尚未见有充分关注。^② 笔者拟以唐宋时期瓜洲为对象，梳理其发育过程与所涉政区变化^③，进而讨论沙洲发育对滨水区域地域结构的影响。

* 本文为中国大运河研究院重点课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瓜洲古镇的历史地位与旅游开发研究”（项目编号：DYH202112）、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地方志专项课题“方志资料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 ① 以长江江苏段为研究对象，较具代表性成果如民国时期朱福成《江苏沙田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9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35930页）、施和金《江苏历史上的坍江之灾及其社会影响》《沙洲变迁与江苏历史上的坍江之灾》（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苏坍江失地考》《江苏长江岸线的历史变迁与沿江开发应注意的问题》[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中华书局，2009年]、印志华《从出土文物看镇江镇扬河段的历史变迁》（《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杨霄《1570—1971年长江镇扬河段江心沙洲的演变过程及原因分析》（《地理学报》2020年第7期）等。讨论沙洲产权与社会问题的，则有张晖《公产与民业：清代镇江洲田的产权结构探析》（《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庞煊麟《沙洲坍涨与地方社会变迁：以镇江丹徒开沙诸洲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
- ②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瓜洲的发育过程及该地的漕运与经济，较具代表性的如邹逸麟对瓜洲的形成过程、水运交通枢纽地位、江岸变迁与衰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参见邹逸麟：《瓜洲小史》，罗卫东、范今朝主编：《庆祝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6—111页）；张程娟探讨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的关系，分析瓜洲筑闸对漕运制度与国家财政的影响及不同运军过江方式背后不同群体对运河利益的争夺（参见张程娟：《争夺运河之利：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2辑）。
- ③ 政区对自然地理变化的响应，近见段伟《历史政治地理对水患的响应：以明清时期的黄淮平原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有较详细的论述，其中部分论及本文研究的对象瓜洲，但主要聚焦于明清时期的坍江下的政区变化。

一 从涨沙到中唐并岸的瓜洲归属

嘉庆《瓜洲志》载：“汉以后江中涨有沙碛，形如瓜，故名瓜洲。”^①该叙述比较模糊，由于沙洲的成型并非一朝一夕^②，其初生何时不得而知，但至迟到唐代，瓜洲已有一定规模。《新唐书》载开元十四年（726），“润州大风自东北，海涛没瓜步”^③；《旧唐书》则记为“没瓜步洲”^④；《旧唐书·永王璘传》又载裴茂陈兵于瓜步洲伊娄埭^⑤；同书《玄宗纪》记齐澣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洲浦”^⑥。按南朝任昉云“水际谓之步”，吴楚间谓“浦”为“步”，语而讹也^⑦，则“瓜洲浦”即为“瓜洲步”，早期瓜洲尚无定名，上述诸名称名异实同，都指润、扬间的大型沙洲。唐代以前，瓜洲上游百里已有瓜步这一地名，鲍照《瓜步山楬文》云：“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⑧是山处长江折角，拓跋焘曾陈兵于此以窥建康。^⑨瓜洲早期以“瓜步”为名，表明二者间存在联系^⑩，但二地相去百里，在史籍中当时并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沙洲，比较合理的情况应该是这一江域内存在一个沙洲群，呈串珠状散布于江流之中，一直延伸到润扬间。刘宋时谢朓于南京见“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⑪，初唐张若虚在

① 嘉庆《瓜洲志》卷1《疆域》，《扬州文库》第1辑，广陵书社，2015年，第38册，第124页。

② 长江中沙洲的形成与发展是复杂的自然地理问题，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牟发松指出魏晋时代长江中游农业开发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可能是长江中沙洲形成的原因之一（参见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 《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931页。

④ 《旧唐书》卷37《五行》，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58页。

⑤ 《旧唐书》卷107《永王璘传》，第3265页。

⑥ 《旧唐书》卷9《玄宗下》，第210页。

⑦ 任昉：《述异记》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1047册，第627页。

⑧ 鲍照：《鲍明远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3册，第608—609页。

⑨ 《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05页。

⑩ 按，“瓜洲”与“瓜步”的名称问题自古受人重视，古代学者中，当以王鸣盛考论最详，王氏条列史料，区分了瓜洲与瓜步，但未考虑两者的联系（参见王鸣盛撰，陈文和等校点：《十七史商榷》卷79《新旧唐书十一》“瓜洲瓜步”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31—535页）。近人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邹逸麟提出的两种猜测（参见邹逸麟：《瓜洲小史》，第107页）。不过近来出现两种新的讨论意见。一是邹旻认为瓜步等涉瓜地名中的瓜本皆作“窠”，同“窠”，有地势低下之意，并指出瓜洲诸名称皆由“瓜步”地势低洼的水边泊船处这一含义得名。其对“瓜步”地名来源的分析，令人信服，但认为瓜洲亦得名自瓜步本义的观点不妥，这无法解释瓜洲“瓜步沙尾”这一名称的由来（参见邹旻：《试论“瓜洲”“瓜州”“瓜步”“瓦埠”等古代类似地名的原初含义——兼论“长沙”“黄浦”“蚌埠”等类似地名》，《中国地名》2020年第8期）。二是2015年在瓜洲一居民家中发现的唐“瓜洲”石刻，据称是祖上从古运河边捡得，虽至今未详细披露，但媒体报道了部分内容（<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5/04-13/7203713.shtml>），碑上有“乾符五年戊戌”“杨子县南江滨乡瓜洲”等字。按印志华以墓志碑刻考证扬州乡里（详后文），已发现今扬子津附近有江滨乡，今瓜洲镇附近有后江乡，但此碑原本埋地不确定，降低了其价值。或又以瓜洲即瓜洲，但瓜字本义河流支流，且活跃于乾符五年（878）前的张祜诗中已多次提到瓜洲（参见张祜：《瓜洲闻晓角》《题金陵渡》，《全唐诗》卷511《张祜二》，第15册，第5837、5846页）。因此对此碑或许需要再加以讨论。本文基本赞同邹逸麟提出的第二种可能性“瓜步江名延伸至扬子、京口间，因而此处出现的积沙，冠以‘瓜步’之名”。

⑪ 谢朓：《又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7册，第586页。

扬州见“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①，都表明南朝隋唐以来，该段江中确散布着许多沙洲。

瓜洲处于这一沙洲群的东段，故也有“（瓜步）沙尾”之名，到开元二十五年（737），或因涨沙，或是诸沙洲合并，瓜洲已有较大规模。时漕船自润州北行过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为解决舟船迂回过远的问题，润州刺史齐澣于瓜洲开伊娄河25里，并在河口置埭。此举使漕船可横穿瓜洲，直达扬子津，航程缩短又无风波之虞，岁减运钱数十万。^②此时的瓜洲东西至少达30里，南北达到25里。从纡汇60里来看，瓜洲与北岸间尚存在一条夹江，按伊娄河长25里，为使航程缩短，这条运河必定端直，而北宋蔡居厚说润州大江原与今扬子桥为对岸，瓜洲并岸后“扬子距江尚三十里”^③，可推知开河时此夹江宽约5里。

在沙洲积涨的同时，北岸扬子津以南的土地也在不断淤积^④，在两者共同作用下，瓜洲最终同江北连成一片。^⑤齐澣修伊娄河时，瓜洲“遥隶润州，故澣得以改置漕路”^⑥，而到唐代宗时期，时任扬州刺史、淮南节度观察使张延赏以“边江之瓜洲，舟航凑会，而悬属江南”，故“奏请以江为界”^⑦。这次行政隶属的变动可作为瓜洲并岸时间的下限。查张延赏大历二年（767）“拜河南尹，充诸道营田副使”，后任扬州刺史，不久以母忧去职，“数年，改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建中四年（783）仍在四川。故瓜洲由润州改隶扬州的时间当在大历二年至大历十四年的10年间，沙洲并岸不晚于此。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右丞元琇判度支，条奏韩滉“督运江南米至扬子，凡一十八里，扬子以北，皆元琇主之”^⑧。18里正是当时润扬之间的江面宽度^⑨，表明改隶以后这块原沙洲确归入扬州扬子县。

在大历改隶扬州之前，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瓜洲“遥隶润州”的情况。据前文梳理，开元二十五年瓜洲南北宽25里，其北端距北岸5里，南端距南岸约18里，从道理上看理当同北岸更紧密，何以当时遥隶润州？由于缺乏史料，只能略作推测，合理的解释或如今日崇明岛之情况。今

①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全唐诗》卷117《张若虚》，中华书局，1960年，第4册，第1183—1184页。

② 参见《旧唐书》卷9《玄宗下》，第210页；《旧唐书》卷190中《齐澣传》，第5038页。

③ 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24引《蔡宽夫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0册，第178页。

④ 汉代以前，扬州居民主要生活于蜀冈之上，汉至六朝，居民活动扩大到蜀冈以下。在今蜀冈之下的扬州城内所发现的唐代文化层底部，往往在黄沙生土面上出有六朝青瓷，其下的黄沙生土就是江岸的淤沙土，可见居民大规模迁居到蜀冈之下生活始自六朝时期，到隋代，江岸则扩展到扬子津，且土地淤涨的趋势依然在继续（参见罗宗真：《扬州唐代古河道等的发现和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0年第3期）。

⑤ 韩茂莉认为最晚不会迟于开元二十五年，理由是当年齐澣开伊娄河（参见韩茂莉：《唐宋之际扬州经济兴衰的地理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邹逸麟认为瓜洲并岸在代宗时，依据是此时瓜洲的政区变动，并以李绅言大历后扬州“潮信始不通”为佐证（参见邹逸麟：《瓜洲小史》，罗卫东、范今朝主编：《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第107页）。

⑥ 史弥坚修，卢宪纂：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3册，第2368页。

⑦ 《旧唐书》卷129《张延赏传》，第3607页。

⑧ 《旧唐书》卷129《韩滉传》，第3601页。按，扬子即扬子县，高宗永淳元年（682）析江都县置，治扬子镇（今扬州邗江区八里桥镇扬子桥）（参见《旧唐书》卷40《地理三》，第1572页；《新唐书》卷41《地理五》，第1052页）。

⑨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59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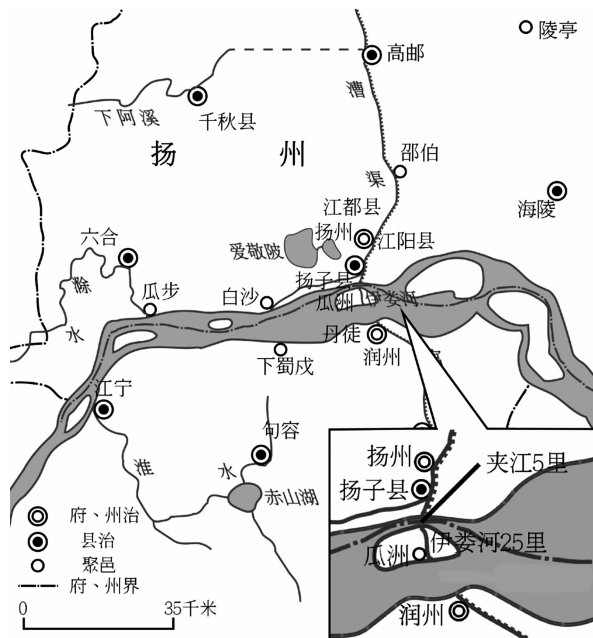


图1 开元二十五年(737)瓜洲示意图

说明：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唐淮南道》《唐江南东道》改绘，参考《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修改天长县为千秋县，并在瓜洲上绘出伊娄河

崇明岛的形成较为复杂，是由复数沙洲合并发育而来，其中的永隆沙和兴隆沙由于最初离崇明岛较远，归南通市管辖，且在与崇明岛合并后仍隶南通。瓜洲源于润、扬间的沙洲群，其中众多沙洲最终形成了瓜洲，这一沙洲群的南端距长江北岸30里，距南岸润州18里，因此其中南部的沙洲当属于润州，且在诸沙洲合并为瓜洲后仍然如此。这种推测也表明即便是最终形成的大规模的瓜洲，最初很可能也分属两州，遥隶润州不代表整个沙洲的情况，但齐漣置埭的河口“边江舟航凑会之地”是由润州管理。

瓜洲并岸后，扬州城与长江的距离由此前的10余里增至40里，旧扬子渡口为沙洲所阻，在沙洲并岸前，这里是唐代扬子县的治所扬子镇。印志华根据扬州出土墓志确定古代乡里之位置，并据此推测诸县的辖境，指出扬子建县不独分自江都县，后还割隶了江阳县的部分土地，到晚唐时期扬子县北界西起今新河湾至汤汪街道一带，南界滨江，县域广阔。^①

滨江的瓜洲镇与白沙镇继扬子镇兴起。瓜洲上早有聚落，并岸以后渐为南北襟喉，村、渡、馆、市齐全。^②《元和郡县图志》载：“瓜洲镇，在县南四十里江滨。昔为瓜洲村，盖扬子江中

① 参见印志华：《从出土唐代墓志看扬州古代县、乡、里的设置》，《扬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东南文化》2001年增刊），第125—132页。

② 如唐张祜《题金陵渡》云：“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全唐诗》卷511《张祜二》，第15册，第5846页）。萧颖士任扬州功曹，“秩满南游，济瓜洲渡”（《太平广记》卷332“萧颖士”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2641页）。许浑《瓜洲留别李颀》云：“孤馆宿时风带雨，远帆归处水连云。”（许浑撰，罗时进笺证：《丁卯集笺证》卷8《瓜洲留别李颀》，中华书局，2012年，第498—499页）。《太平广记》载：“壬午岁。广陵瓜（州）〔洲〕市中，有人市果实甚急。”（《太平广记》卷355“杨副使”条，第2809页）。

之沙碛也。”^①可见至迟到元和年间，瓜洲已设镇。宝历二年（826），“崔从镇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申浙右试竞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没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②。船没于金山之下，正与瓜洲南北相对，故此处的“瓜步镇”不太可能是远在百里之外的瓜步，而是瓜洲，此时瓜洲、瓜步仍然混称。^③大致同一时期，瓜洲镇西侧又有白沙镇^④，崔致远《张雄充白沙镇将》云：“眷彼古津，实为要路。是成镇务，乃在江壖，既居使府之要冲，宜假公才而管辖。况兼场货，可贍军须。且卷豹韬，共养斩蛟之勇。”^⑤特别强调了白沙镇的重要性。安史之乱后，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强藩占据，扬州作为漕粮运输孔道的战略地位突出，而唐后期江淮地区的情况又比较复杂，二地设镇可能就源于此。^⑥瓜洲的并岸与改隶改变了江北扬州的地域结构，扬州州治的滨江区位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滨江的瓜洲镇与白沙镇。扬州城、瓜洲镇、白沙镇成为三角形的三端，瓜洲镇通润州以趋浙东，白沙镇连接江宁与长江中上游，成为扬州沟通长江三渠道中的中道与西道。^⑦这一交通体系自唐代以来逐渐强化，并影响到其后续发展。

二 割县与升州：五代宋初扬州沿江区域的政区调整

五代时，扬子县与瓜洲、白沙二镇皆曾改名。杨吴顺义二年（922），白沙镇改迎銮镇，南唐昇元元年（937），扬子县改永贞县。^⑧1964年出土于扬州市邗江区运西乡鞠庄村薛前庄（今瓜洲镇西北）的《南唐太原郡王氏夫人墓志》有“保大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微疾终于广化镇寝舍”“有男延禧，充广化镇遏使、沿（沿）江裹（裹）运水军指挥使，钤辖诸事务”“保大四年正月十四日葬于永贞县广化镇后江乡附葬莹所庄上”^⑨等语，表明至迟到保大四年（947），瓜洲镇改名广化镇，并设有镇遏使、水军指挥使等职。

不论是经济上的渡口市镇发展，还是军镇的镇官、军队的设置，都表明广化、迎銮二镇地位的升高。朱温曾见镇将位在县令上，云“令长字人也，镇使捕盗尔。且镇将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是无礼也”，遂敕天下镇使位在邑令下。^⑩永贞县内存在两个军镇，这在动乱的唐末五代或有其合理性，但到北宋以后，则非统治者所乐于见到。尤其是迎銮镇，

①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2《淮南道》，第1072页。此条记载辑出于《太平寰宇记》。

② 《太平广记》卷155“崔从”条引《独异志》，第1115页。

③ 瓜洲拥有专名的时间较晚，但至迟不过北宋中期，贺铸《九日寄维扬刘明仲》云：“扬舫瓜步背瓜洲，底处孤亭是玉钩。”（贺铸：《九日寄维扬刘明仲》，《全宋诗》卷1111《贺铸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册，第12602页）这或与之在北宋漕运中地位的提升有关。

④ 设置不晚于唐宣宗大中二年二月（参见《旧唐书》卷18下《宣宗》，第619页）。

⑤ 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卷14《张雄充白沙镇将》，中华书局，2007年，第478页。

⑥ 唐后期扬州地区藩镇有关的政治情况，可参见蔡帆：《朝廷、藩镇、土豪：唐后期江淮地域政治与社会秩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

⑦ 参见严耕望：《唐代扬州南通大江三渠道》，翟志成主编：《景印香港新亚研究所〈新亚学报〉》第17卷，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⑧ 参见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23《淮南道一·扬州》、卷130《淮南道八·建安军》，中华书局，2007年，第2442、2573—2574页。

⑨ 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卷148，黄山书社，2012年，第403—405页；扬州博物馆编：《扬州博物馆藏唐宋元墓志选辑》，广陵书社，2018年，第84页。两书句读差异不大，后者附有拓片图。

⑩ 参见《旧五代史》卷5《太祖纪第五》，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83页。

自吴都江都，徐温、徐知诰居金陵，立国后“改金陵为西都，以扬州为东都”^①，迎銮镇作为金陵、扬州往来要地，重要性迅速提升。于是到北宋初年，宋廷逐步对扬州的州、县进行调整。

据《太平寰宇记》，扬州初领七县，后缩减为三，其中“永贞入建安军”是滨江政区调整的关键事件。同书“建安军”条载迎銮镇“建隆三年升为建安军。雍熙三年，仍割扬州之永贞县以属焉”^②。但《元丰九域志》对迎銮镇升军及永贞割隶的具体时间记载不同，称迎銮镇升建安军在乾德二年（964），永贞县隶建安军在雍熙二年（985）。^③核《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乾德二年八月）庚申以迎銮镇为建安军”^④，则当以《元丰九域志》记载为准。到至道二年（996），扬州六合县改隶建安军，大中祥符六年（1013），永贞县改名扬子县^⑤，同年，因“筑圣像成功”，建安军升为真州，至此真州辖扬子、六合两县，治扬子县。^⑥与升军升州的迎銮镇相比，广化镇则逐渐完成军事建制镇到经济市镇的转化，更名回瓜洲镇，原先的镇遏使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以收取税收为主责的文官监镇，如酒税官^⑦、镇监官^⑧等。

雍熙二年永贞县“割隶”建安军，对于这次割县需要加以考证。唐末以来的永贞县以扬子镇为州治，县南濒江，瓜洲镇、白沙镇皆处县域。割县以后，《元丰九域志》载江都县辖扬子镇、瓜洲镇在内的七镇，天圣年间袁康任江淮发运使“归老于扬州之瓜洲”^⑨，到南宋初年郑兴裔云：“（漕河）西南自仪真江岸，东行四十里至石人头，入江都县界。又十五里至扬子桥。南自江都县瓜洲镇站船坞，北行三十里亦至扬子桥。”^⑩综上可见永贞县改隶建安军时只划割了县域之西境，县之东境（南起瓜洲滨江，北过扬子镇）则划归江都县，其东、西境的分界线约在石人头（今仍存，在古运河畔，去仪征约18公里，距扬子津约6—7公里）。伴随着县域的一分为二，永贞县的县治也存在迁移，县治旧在扬子镇，割县以后则以白沙镇地为县治，而旧县治所在地的扬子镇归江都县，是以真州有扬子县^⑪，扬州江都县有扬子镇。^⑫

① 《旧五代史》卷134《李昇传》，第1786页。

② 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23《淮南道一·扬州》、卷130《淮南道八·建安军》，第2442、2573页。

③ 参见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5，中华书局，1984年，第192、198页。

④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八月庚申条，中华书局，1995年，第131页。

⑤ 参见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6之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387页。

⑥ 参见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5，第198—199页。

⑦ 《宋会要辑稿》载：“（隆兴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诏杨（扬）州泰兴县柴墟镇酒税官兼管烟火公事，以杨（扬）州言，管下邵泊（伯），瓜州镇皆兼烟火，与本镇事体一同，故有是命。”（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12之二十，第9531页）

⑧ 李庭芝曾奏充江润生为瓜洲镇官（参见曹弘斋《泾》）：《庐州梁县尉事天先生江公润身墓志铭》，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95上《行实文苑》，黄山书社，2004年，第2398页）。

⑨ 王令：《广陵集》卷29《左班殿直袁君墓铭并序》《前左班殿直袁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6册，第551—552页。

⑩ 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平山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第216页。

⑪ 陆游“晚至真州，泊鉴远亭。州本唐扬州扬子县之白沙镇。”（陆游：《入蜀记》卷2，《全宋笔记》第5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8册，第168页）。

⑫ 熙宁五年（1072），日僧成寻北上至“扬子镇江都县”（〔日〕成寻著，白化文、李鼎霞点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依上梳理,尝试绘出真、扬境内“推定县界”,作分别对应永贞县隶建安军前的雍熙元年(984)与建安军升真州后的大中祥符六年政区示意图如下。^①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谭图,笔者将真、扬州界适当东移。谭图原绘州界较靠近真州州治,然从仪征江岸起东行40里至石人头入江都县界,又15里至扬子桥,州界当在更靠近扬子镇的位置。又谭图北、南宋图皆绘陈公塘于扬州境内。查熙宁九年(1076)有“扬州陈公塘”^②的说法;绍兴四年(1134)“拆毁真扬堰闸及真州陈公塘”^③;又淳熙九年(1182)钱冲之云“真州之东二十里,有陈公塘……大中祥符间,江、淮制置发运置司真州,岁借此塘灌注长河,流通漕运……乞于扬子县尉阶衙内带‘兼主管陈公塘’六字”^④。考虑其位置当在石人头西,以在真州境内为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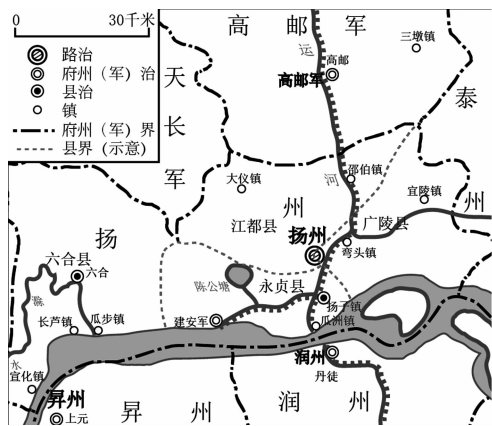


图2 雍熙元年扬州政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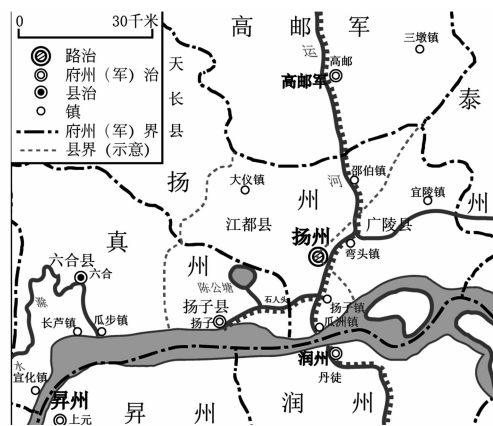


图3 大中祥符六年真、扬政区示意图

说明: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两淮路图》改绘

宋初扬州滨江区域的政区调整是对瓜洲并岸以来该地持续发展结果的肯定,也是对其地域结构的重新构建。真州从扬州分出后,扬州的漕运地位渐被真州取代,这已是学界共识^⑤,如楼钥云:“维扬、楚、泗俱称繁盛,而以真为首。”^⑥但这并不意味着扬州的衰弱,而是一种区域内的此消彼长,因为“扬州”实际上包括了真州与扬州。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唐末五代以来扬州南部滨江区域快速发展,扬州才有了分为二州治理的必要。在建安军升州过程中,宋廷通过析县分属的方式达成了真、扬各占有一条出江河道的局面,一方面巩固了真州沟通长江中上游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也确保了扬州由润州通往东南的交通,借此形成了昇、润、真、扬四州两两相对

① 图2中六合、永贞间县界为参考今界的推测,永贞、江都、广陵县界则主要参考印志华观点[参见印志华:《从出土唐代墓志看扬州古代县、乡、里的设置》,《扬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东南文化》2001年增刊),第130页]。图3中天长、真州县界延图2天长军、扬州州界而来。

②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2,熙宁九年元月壬申条,第6661页。

③ 《宋史》卷97《河渠七》,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393页。

④ 《宋史》卷97《河渠七》,第2394—2395页。

⑤ 参见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和衰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7年;韩茂莉:《唐宋之际扬州经济兴衰的地理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

⑥ 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51《真州修城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58—959页。

的地域结构。《宋会要辑稿》载北宋真、扬商税，熙宁十年（1077）真州在城达53536贯，扬州在城与瓜洲镇合49539贯^①，在酒曲与盐岁额上，真州城也与扬州城加瓜洲镇相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宋初对这一区域政区调整的合理性。

三 南宋瓜洲遥隶镇江的现象与合理性

北宋真州从扬州析出后，瓜洲镇属扬州江都县，《方輿胜览》载：“瓜洲渡，在江都县南四十里……介于江、淮之间，南之潇湘，北走秦、陇。”^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诸将）弑（完颜）亮于扬州瓜洲镇之龟山寺。”^③其行政归属似乎没有疑问。不过，在某些记载中，瓜洲又与镇江联系密切，乾道四年（1168）镇江都统军王友直奉诏修筑瓜洲城的行为^④并不能代表行政关系，但宝祐四年（1256）五月，赵与峕以朝议大夫总饷兼镇江知府^⑤，至顺《镇江志》载：“是时，瓜洲遥隶镇江，宫人给官会三十万，使修瓜洲城壁。”^⑥既被列入《杂录》，可以推测“遥隶镇江”的政区变化是较为短促和临时的。

瓜洲与镇江的紧密联系，自南宋初年已有端倪，如建炎元年（1127）九月，赵万陷镇江府，知镇江府赵子崧“弃城渡江保瓜洲”^⑦。绍兴二年（1132）八月，吴表臣奏论当时长江的重要渡口，其略云“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不过十郡之间，其要紧处，不过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紧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紧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洲是也。”^⑧吴氏将江北的宣化与瓜洲分别系于建康、镇江之下，从其表述来看，这种关系当为行政关系。

相较于扬、润以江为界的政区界限来说，这种跨江遥隶显然是特殊的。由于史料不足，这种遥隶具体在何时，为何种情况很难考证清楚。问题在于，宋廷为何要以瓜洲遥隶江南，此种政区的调整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何合理性？周振鹤曾指出：“在政治因素之外，军事因素也是对政区的分划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则因为军事行动直接与政治目的相关，二则由于国防治安

① 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三、四、五，第6320、6322页；食货19之十一，第6404、6405页；食货22之八、九、十一，第6468、6469页。

② 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卷44《淮东路·扬州》，中华书局，2003年，第793页。

③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边防二》“女真南徙”条，中华书局，2000年，第841页。

④ 参见顾炎武撰，谭其骧、王文楚等点校：《肇域志》第1册《南直隶·扬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⑤ 参见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15《刺守·宋太守》，“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814页。

⑥ 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20《杂录》，“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879页。

⑦ 《宋史》卷24《高宗一》，第449页。按，赵子崧本传记载不同，云“率亲兵保焦山寺”，非屯瓜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参见《宋史》卷247《赵子崧传》，第8745页；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条，第256页）。

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辛丑条，第1155页。按，荆南即荆南府，建炎四年（1130）由江陵府改，淳熙三年（1176）改回，府治江陵。岳之北津无考，岳或指岳州（今岳阳），不过笔者暂未发现北津这一地名。在宋代史料中，襄阳常被称作“楚之北津”。若岳非指岳州，而是泛指楚地，则岳之北津即指襄阳，但襄阳在汉水上游，且这种表述同其他六渡完全不同，可暂作为一种可能性。鄂即鄂州，治江夏（今武昌），南宋武昌在今鄂州，与黄冈相对。太平即太平州，有东、西采石渡。建康即建康府，宣化镇（今南京市西北浦口镇）与建康隔江相对。

方面的特殊需要。在军事因素的作用下，政区的幅员、形状、边界等方面都有特殊的表现。”^①瓜洲遥隶镇江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瓜洲遥隶镇江，至少有以下几点合理性。

首先是构建江防体系。瓜洲在军事防御体系上同镇江更密切，而与扬州离心，这在南宋初年的战争中就有所体现，时真、扬已下，但瓜洲仍在坚守，最后陷落。^②南宋对于北方政权的军事态度有防江和防淮之争，真、扬沿江是淮防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时人眼中该线设防伴有弃淮守江之意，如张浚云“欲驱兵卒但于江干建筑城堡，岂不示虏削弱，失两淮之心，堕将士之气？或有缓急，谁肯守两淮者？”^③而持守江论的知镇江府兼都大提举浙西兵船王埜则认为“江面几千里，调兵捍御，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狭，请免镇江水军调发，专一守江，置游兵如吕蒙所言‘蒋钦将万人巡江上’，增创水舰，就扬子江习水战，登金山指麾之”^④。淳祐初年，瓜洲北扬子桥有警，王埜“急调汤孝信所领游兵救之而退”^⑤，王埜的江防体系是以镇江中心，将瓜洲滨江地区也纳入其中，因此才能对瓜洲北扬子桥的军务有迅速的反应。

其次是利于江淮的粮草供给。物资运输是影响政区变动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⑥，南宋时，驻扎于江淮地区的军队多借长江以南的粮草供应，瓜洲新仓是“江东纲”的集散地，粮草不至则误军期^⑦，而以长江为界的政区架构给粮草的交割造成困难。乾道元年（1165）二月十三日，淮南转运判官韩元龙奏：“淮东路逐年收买镇江诸军一半本色马草二十五万束，赴镇江府北草场交纳……本司照应，本路所买马草，系是茭草，八、九月内收刈，十月始干。装发之间，潮水不应，隔江阻闸，艰于津发。若不别行措置，窃虑迟滞，有误支遣。欲于瓜洲镇置场交受，令镇江府诸军用船过江前来就支，止是一水，委是快便。其监官令瓜洲监镇或监闸、巡检兼管，及本司依先降指挥别差官一员同共收纳。就用镇江府北草场合干人兼行管干，更不别置官吏。”获得批准。^⑧从奏文看，淮东路收买的马草在瓜洲交纳较之镇江更为便利，倘若加之瓜洲遥隶镇江，则粮草转运的效率会进一步提高。黄榦曾云：“京口之有瓜洲，所以通淮浙往来之道，武昌之视汉阳，犹京口之视瓜洲也。”^⑨“淮浙往来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队过江与战争物资的后勤

① 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第5章《特殊行政区划简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② 建炎初年高宗由扬州南逃，金军铁骑临瓜洲（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癸丑条，第456页）。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南侵，十月，真、扬两州相继失守，时任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刘琦退军瓜洲，败金兵于皂角林（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壬戌、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乙丑条，第3769、3771页）。十一月，金人再犯瓜洲渡，失利后焚驩亭而去，后金军又增重兵，瓜洲失陷（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庚午、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壬申条，第3781、3784页）。完颜亮于采石渡江失利后转由瓜洲渡江，并于此身死。

③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5下《少师魏国张公行状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20页。

④ 《宋史》卷420《王埜传》，第12576页。

⑤ 《宋史》卷420《王埜传》，第12576页。

⑥ 如《宋史·刘综传》载：“先是，天长军及扬州六合县民输赋非便，综奏请降天长军为县，隶扬州，以六合县隶建安军，自是民力均济。”（《宋史》卷277《刘综传》，第9431页）

⑦ 参见洪适：《盘洲文集》卷42《会计军储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8册，第526页。

⑧ 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四十二、四十三，第6899—6900页。

⑨ 黄榦：《勉斋集》卷28《汉阳申朝省筑城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299—301页。

运输。

最后是便于津渡管理。瓜洲渡是长江下游重要渡口^①，南宋初年受战乱影响，大量民众由此南逃，“扬州士民，南渡入浙甚众，日不下数百家”^②。南北对峙时，防范北来奸细成为津渡管理的重要任务，淳熙二年（1175）诏“自今扬州瓜洲渡、镇江西津渡，并令本处巡检兼监渡”。淳熙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知镇江府司马伋言：“镇江府沿江一带私渡颇多，除西津关、瓜洲岸系官渡外，其余私港不惟般载违禁物货、铜钱过江，仍恐透漏奸细。乞除炭渚港、高资东西港、丹徒东西港、谏壁港、大港共七处许本处土豪经营……其余私港三十余处，并不许私渡。”司马伋讨论镇江府沿江渡口，却将北岸瓜洲列入其中，且所述诸渡，只瓜洲岸一处江北，其余沿镇江江岸东西分布，瓜洲渡与江南诸渡是一对多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不久淮南运判徐子寅乞罢真、扬等地沿江私渡，虽然提到瓜洲官渡，却无提及南岸渡口的情况。^③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即便瓜洲或未隶镇江，也极为镇江官员重视，倘若瓜洲渡归镇江管理，两州间的渡江河段将成为镇江内部水道，在南宋严查渡江的背景下，不易在河中形成管理真空区，也可以避免遇事两地因统辖界限不明而相互推诿的情况。

瓜洲遥隶镇江可能是短期且临时的，但它却反映了另一种地域结构，相较于以江为界的政区划分，跨江遥领的模式更重视对水域的控制。前文所述政区调整的合理性，其实质都是加强两岸联系，使北岸、长江、南岸成为一个整体，以此为基础构建江防体系，便于军船、粮船往来，便于水道的管理。这种地域结构，在南宋末年的战争中又得到体现。当蒙兵将战略重心移向长江中上游，顺流向下攻克建康、镇江等地后，扬州的宋军仍在坚守，蒙军遂以瓜洲钳制扬州^④，《元史·阿术传》载：

世祖以宋重兵皆驻扬州，临安倚之为重，（至元十二年）四月，命阿术分兵围守扬州。……既抵扬州，乃造楼橹战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树栅以断其粮道。……时诸军进取临安，阿术驻兵瓜洲，以绝扬州之援。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为多。^⑤

蒙军的举措卓有成效，数次击退了宋军的进攻，甚至后来宋帝由此北上，扬州守军也无法将之夺回。^⑥“庭芝水路即绝，必从陆出”，也就是说，对江北与江南的交通而言，扬州城事实上无足

① 自北宋起就设有巡检，大观元年（1107）更于“杭越之钱塘、西兴，扬润之瓜州、西津，淮口之盱眙、临淮各置都巡检一员，于江淮岸侧置营寨屯守，分部地界，为沿淮巡检悉隶之，以时巡察奸盗。”（至顺《镇江志》卷11《营·丹徒县》，“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474页；民国《瓜洲续志》卷27《杂文·宋大观元年置瓜洲都巡检御札》，《扬州文库》第1辑，第38册，第729页）

② 叶梦得：《石林奏议》卷5《奏乞差官监辖过江舟船札子》，《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4册，第414页。

③ 以上据《宋会要辑稿》方域13之十三、十四，第9539—9540页。

④ 仅据《元史》所载，先后屯于瓜洲者就有阿术、塔不己儿、相威、阿塔海等将领（参见《元史》卷128、123、129《阿术传》《相威传》《塔不己儿传》《阿塔海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123、3129、3034、3149页）。

⑤ 《元史》卷128《阿术传》，第3122—3123页。

⑥ 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6，“张世杰李庭芝姜才”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599页。

轻重,关键是瓜洲等沿江重要渡口,元军顺长江而来,控制长江及两岸要津后就切断了扬州军队南下的可能。后来文天祥与苗再成在真州欲南渡勤王时,认为要先“以通泰军攻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军攻扬子桥,以扬州兵向瓜洲”,后以“湾头、扬子桥合兵攻瓜洲之三面”,瓜洲城克复,则可舟师直捣镇江^①,事实上也将瓜洲作为其战略的核心之一。上述事例表明,尽管瓜洲与扬州城相距不远,但与后者不同,前者同长江及江南联系密切,这种地域结构的差别是沙洲并岸带来大量土地后逐渐形成的,也成为南宋军事背景下该地政区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结 语

中唐以来瓜洲渐并同北岸扬州相连,这一自然地理现象引发了唐宋时期扬州滨江地区政区的频繁变化,这些变化包括重新划界、政区新建与升降、地名更改、治所迁移。无论是宋初永贞县的析县还是南宋瓜洲遥隶镇江的失载,都表明地理总志、地方志并不能完全体现政区,尤其是县及县以下政区短促复杂变化的全貌。总的来说,唐宋时期扬州滨江政区变化可分以下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中晚唐时期,瓜洲规模扩大并同北岸相连。瓜洲由复数沙洲合并而来,这些沙洲分属两岸,所以形成的瓜洲也分属两岸,直到瓜洲并岸以后以江为界。这一时期的政区变化相对比较简单,距离是决定沙洲归属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沙洲成为滨江土地后,则依从山川形便。

二、五代宋初,扬州滨江区域政区调整。沙洲的并岸带来了大量土地,扬州城失去滨江区位后,白沙镇与瓜洲镇逐渐发展起来,最终真州从扬州析出,得到六合县与永贞县之西境。这一时期的政区变化,主要是出于滨江地区发展后重建滨江地域结构的需要,真州从扬州析出后,二地经济相当,分别处长江北岸交通之要区,体现出宋廷对政区的平衡。

三、南宋时期,瓜洲短时间内遥隶镇江,这在南宋军事背景下有其合理性。瓜洲的积涨与并岸使江面收束,从曹丕临江叹“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到陆游“南望京口月观、甘露寺、水府庙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②,变化十分明显,作为天堑的长江无疑是政区的天然分界线,但当其江面收窄后,这一界限就不再稳固。^③以江为界与跨江遥隶实际代表着滨水地区两种不同的地域结构,后者重视对水域的控制,因此在军事气氛浓郁时通过政区变化而凸显。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宿万涛

^① 参见刘岳申:《文丞相传》,《文天祥全集》卷19《附录》,中国书店,1985年,第489—490页。

^② 陆游:《入蜀记》卷1,《全宋笔记》第5编,第8册,第167页。

^③ 按,镇、扬江面缩短的趋势,基本贯穿了唐、宋、元、明时期,且更可追溯至汉末魏晋。顾祖禹对此有概括性总结,其略云:“唐、宋以来,濒江洲渚日增,江流日狭。初自广陵扬子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面阔犹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犹十八里,今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顾祖禹著,施和金、贺次君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23《南直五》“扬子江”条,中华书局,2005年,第1117—1118页)。